

戴逸文集

清后期史

戴逸文集

清后期史

目 录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1
慈禧、奕訢斗法记	4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8
洋务历史试论	12
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21
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 ——纪念刘铭传	25
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	32
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40
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49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58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62
甲午海战与中日两国的命运	66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70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106
爱国、先进的改革家、思想家谭嗣同	117
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罢官缘由辨析	120
百年功过论戊戌	136
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	143
我看张之洞	164
谈翁同龢	168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170
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	177
光绪之死	181

光绪之死与袁世凯“告密”真相	192
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	200
唐文治小传	211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216
辛亥革命的教训和社会主义的选择	220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226
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	237
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	245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260
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	267
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	269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280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寿父子	288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纪念张伯苓先生	291
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	294
专制统治的延续、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明清（公元 1368 年至 1911 年）	302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件战斗武器，并不是邪教。要判断它是不是邪教，不能只看它的外部特征，还要看它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当时社会上阶级关系十分紧张，下层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工具来动员与凝聚分散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促进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拜上帝会就是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拜上帝会动员、宣传、组织和指挥了太平天国起义。乍一看来，似乎远离世俗的宗教制造了一场农民战争，因此有的先生说“政治邪教引起了太平天国战争”。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应该是世俗的利益冲突，是官府、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赋予了宗教生命，使这种宗教变成呼唤农民起义造反的工具。不是宗教制造了农民战争，而是农民战争得用宗教加速促成起义。因此，判断宗教的性质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就不能把拜上帝会视为邪教。

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到清代白莲教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历代农民战争大多利用宗教？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担负着供养全社会的重担，但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知识。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平时存

* 本文为2006年7月21日笔者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讨论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信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当地阶级斗争的推动，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可是农民往往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玄想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斗争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但还没有人能科学地说明这场斗争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宗教就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宗教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非作恶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双方壁垒对立分明，一方是天父天兄庇护的百姓，另一方是阎罗妖支持的官府和地主，两个营垒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这种在宗教外衣包裹下的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一旦被农民接受，农民就将自觉自愿、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投入战斗。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将发挥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就像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

封建时期的农民宗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幼稚的、荒诞不经的，但要揭开它的外衣，观察它的实质。洪秀全在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当然，农民不是先进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但后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绝不应该指责这些朴素的思想是空洞的梦呓。

农民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扫荡一切，破坏一切（其实官兵杀人放火，更无恶不作），像一头发怒的大象，它狂奔向前，必定会践踏路边的花花草草，打碎周围的瓶瓶罐罐。农民运动破坏了许多旧事物、旧关系、旧传统，但不能把它视作社会的倒退。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30 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至 20 世纪之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人民的努力下终于土崩瓦解，在中国土地上矗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慈禧、奕訢斗法记*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统治阶级鹰犬们悲惨而可耻的末路。恭亲王奕訢虽然曾经受帝国主义赏识，又把慈禧太后扶上了统治的宝座，但是随后他就被主子一脚踢开，落得和历史上许多统治阶级的鹰犬一样的下场。

19世纪60年代之初，奕訢集团执掌政权，气焰熏天，颇有点“天下莫予毒”的派头，权力、地位、各方面的阿谀吹捧，弄得奕訢有点昏昏然、飘飘然，他自以为和慈禧太后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两个当权者，慈禧和恭亲王，在谨慎地互相监视着。”^①

事实上，就奕訢的实力、地位、统治手段来说，他只配充当慈禧的鹰犬，不配成为敌手。赵烈文对奕訢下过这样的评语：“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②

一切专制暴君绝不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隐然钳制自己的力量，赵烈文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讥评奕訢不理睬自己所处的危险地位。残忍的慈禧势必要把奕訢踩到脚底才会甘心。但是慈禧和奕訢的政治路线基本一致，慈禧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物色不到新鹰犬，不得不仍旧依靠奕訢，这种情况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和曲折性，故而斗争只局限在宫廷琐事上。

*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7日。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②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

一般官书对这场宫廷斗争都讳莫如深，但无意中又透露出蛛丝马迹。

《清史稿·奕訢传》载：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这是慈禧打的第一棒。不过这一棒打得不是时候，奕訢和外国侵略者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侵略者竟跑到总理衙门提出质问。朝廷的威旧大臣也恐慌起来，因为离开了奕訢，他们既无法应付外国侵略者，也难于和湘、淮系汉族地主势力保持均衡。他们纷纷向慈禧进谏，慈禧为形势所迫，只好趁势转圜，让奕訢复职。

1869年奕訢对慈禧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太监安德海奉慈禧的命令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招摇。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据薛福成说，“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①，奕訢自然对安德海痛恨入骨。按照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得擅离北京，所以安德海到达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楨扣押起来。奕訢纠合一批亲贵大臣，极力主张把安德海就地正法，慈禧在奕訢等的压力下，竟无可奈何，只得依议执行。奕訢借丁宝楨的刀，剪除了慈禧的羽翼，而且使慈禧大大地丧失了面子。但是，杀了一个安德海，动摇不了慈禧太后的地位，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复仇怒火。

1874年，在重建圆明园问题上，斗争再一次爆发。自从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联军烧毁之后，慈禧太后少了一个游耍行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希望再建这个名园，重圆她奢侈的旧日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革命大风暴中挣扎过来，财政上千疮百孔，要兴建如此豪华的建筑，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搜刮亿万人民的脂膏，而且威胁到各级大小官吏的钱袋，所以是个很不得人心的措施。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借同治帝亲政的机会，用皇帝名义下令重建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命令发布后，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反对，接着奕訢又出头拦阻，气得慈禧索性撕破面皮，大闹一场，奕訢以“语言失仪”的罪名被革去世袭亲王，降为郡王。盘踞在军

^① 薛福成：《庸盦笔记·书安德海伏法事》。

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訢集团，在大学士文祥的率领下（文祥是奕訢的主要帮手）向慈禧“涕泣力谏”^①，被慈禧臭骂一顿。文祥等称病辞职，以示抵制。两魔斗法，将达半年，弄成相持不下的僵局。一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连远在甘肃军中的左宗棠也自称“半载以来，忧惧靡已”^②。

这时天津发生了一场讼案，给奕訢集团解了围。原来慈禧太后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国、美国商人购买洋木，供建筑圆明园之用。李光昭是个财迷心窍的骗子，所购洋木值五万四千元，他却虚报为三十万两（约合四十二万元），法、美两国奸商更是存心欺蒙，运来的是霉烂脆劣的小块木材，根本不能供园工使用。木材运到了天津，李光昭一看木材的质量、尺寸与原议的合同不符，不肯给价收货，外国奸商就控告到北洋大臣的衙门里，反说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的字样，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这样就弄成了外国奸商与太后、皇帝之间打官司。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恐怕影响到淮军的军饷，也不同意修建圆明园，他索性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公开宣示，请求朝廷指示处理的办法，弄得慈禧太后大出其丑、尴尬万分，只好拿李光昭开刀，说他“诈称内使近臣”，定了斩监候的死罪，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也被革职，圆明园工程只好取消。这场官司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告一段落，不久，奕訢、文祥等均复职。

经过这次斗争，奕訢集团开始认识到慈禧的心狠手辣，只得低声下气，事事逢迎慈禧。这时李鸿章北洋集团已崛起，逐渐取代奕訢的职权；慈禧又勾结上醇亲王奕譞（光绪的父亲）和庆亲王奕劻，以牵制奕訢；奕訢集团的骨干文祥等又相继病死。于是，奕訢集团的势力日益衰落。奕訢虽然仍保持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权，但已沦为政治舞台上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慈禧太后仍不放弃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打击奕訢。1878年华北大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文祥传》。

② 《左文襄公书牍》卷十四，《答李筱轩》。

早，慈禧硬要奕訢对这场天灾负责，把奕訢“交宗人府严加议处”，集团中的宝鋆、沈桂芬、景廉等也受了处分。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在北宁战败，失败的责任主要应该由慈禧和李鸿章负责，舆论对清政府大加抨击。这时，奕訢又被捉来当了替罪羊，奕訢集团全班人马被清洗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譞和奕劻掌握了这两个机构，成为慈禧太后的新鹰犬。

在这场统治者内部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显示了她蛮横、毒辣的专制淫威。但是这种专制淫威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把一切官僚当作鹰犬使唤，正因为她自己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最大鹰犬。奕訢固然和帝国主义最早拉上关系，但是他的实力有限，办事动辄受牵制，不能为帝国主义更好地服务，因此不久就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宠爱。帝国主义发现慈禧和李鸿章是比奕訢更理想的代理人，于是把赌注从奕訢的桌面上拿走，转押到慈禧和李鸿章的桌面上，这是奕訢集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担任了多年驻华公使的美国侵略分子田贝以赞赏的口吻说：摄政的太后，在她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又说：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都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意愿及行使其统治权力的结果。当中法战争中奕訢的职位被奕譞取代，老牌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还为此欢呼，他说：“七爷（按：指奕譞，因为他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将控制这政府，所以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①在侵略者的嘴里，凡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就是“进步”。所以，奕訢的失势对慈禧太后来说是踢开了一只不甚驯服的鹰犬，而代之以更加驯服的鹰犬；对帝国主义来说，也不过是抛弃了一个不是很得力的奴才，而代之以更加得力的奴才。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1867年，奕訢集团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为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条件而发生了公开的争论。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目的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是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最初，同文馆设立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学习三国语言文字，这是中国近代化学校的先声，但它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久上海和广州也分别设立同文馆。

随后，洋务派在各地设立工厂，制造洋枪洋炮，开始感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1866年12月，奕訢等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顽固派从极端保守立场出发，厌恶一切新事物。他们认为，从前的同文馆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值得公开反对，现在居然要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做学生，事情越来越不像话。这对热心保卫圣道的冬烘先生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第一个出来放炮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而且这些都是“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的事情，科举出身的人只应“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①。接着顽固派的主帅——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人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学技艺，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

*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3日。

① 宝鋈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

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即使要学习天文算学，尽可以请中国人任教，何必“奉夷为师”^①？

顽固派既然摆开了攻击的阵势，奕訢集团也不甘示弱，奕訢等反驳说：自强之道，必以轮船、火器为先，学习天文算学是制造轮船、火器的根本，忠信礼义等空话是不能拿到战场上打仗的。我们日夜忙碌、苦心筹划，倭仁一伙人却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从中捣乱，使办事的人心灰意冷，妨碍自强大计。倭仁反对我们的办法，想必他有更好的“自强”妙策，那就请他来办，我们当追随其后；倭仁反对请外国人当老师，那就请他另设一个天文算学馆，找中国老师试一试。^②奕訢这番话自然是将顽固派的军，倭仁哪里有什么“妙策”？又去哪里找中国老师？

接着顽固派于凌辰、钟佩贤、杨廷熙等出来声援倭仁，特别是杨廷熙举出五月初十日刮了两个钟头大风，说是天象示警，应赶快撤销同文馆。又指斥奕訢集团“强词夺理，师敌忘仇，拒谏饰非”，破口大骂一顿。奕訢就咬定杨廷熙的上书是倭仁指使的，骂倭仁“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双方就这样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将近半年。

在这场争论中，奕訢集团得到了表面的胜利。奕訢和倭仁一起上朝时，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訢又命倭仁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这个任命是故意拿顽固老头子开开心，倭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接受，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同龢去看他的时候，“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③。

奕訢集团尽管可以折磨这个顽固老头子，但却不可能战胜和倭仁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整个顽固势力。当时，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同情倭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

①② 宝璽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

③ 《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延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京师口语籍籍，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语“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知名学者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议论，深为倭仁不平。他说：

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齟齬于官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番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稍持国体，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

在李慈铭看来，设立同文馆是一场灾难，向外国学习的人都失去了人格，叫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工作是一种侮辱。李慈铭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一般心理。

经过顽固派的一场搅扰，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奕訢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①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邹伯奇本来已接受同文馆的聘请，要来北京任教，这场争吵发生后，吓得躲在家里装病，不敢来北京。可见顽固派的抵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就事论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好事。顽固派的反对论调既荒谬又可笑，他们像是躲在封闭器内的一堆蛆虫，不愿意有一点新鲜空气透进来。但是顽固派模糊地感觉到西方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挽救封建统治，这一点却是很对的。洋务派开工厂、办学校，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但结果却在洋务派的意料之外。开工厂、办学校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文馆的争论反映着没落封

① 宝鋈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

建阶级无可奈何的哀鸣，顽固派企图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洋务派则企图把历史车轮引入歪曲的轨道，但是他们都是心劳日拙的。历史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而轰然奔向前方，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不能为日暮途穷的封建制度找到出路，他们反而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碾成齑粉。

洋务历史试论*

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时间共30年，占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1/3以上。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军事力量上的较量，结果是中国失败了。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是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与深刻变化，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清政府在国外侵略势力和中国人民的两军对战中力图调整步伐，加固营垒，以应付来自双方的压力。它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强壮剂，在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目的下，仿效西方，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的由来。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间，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

洋务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864年到1871年。这时，清政

* 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

府正在疯狂地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装备反动军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有“船坚炮利”这一点。因此，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沪（江南制造局）、宁（金陵机器局）、闽（福州船政局）、津（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相继创立。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

这一阶段创办的许多官办军事工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混合体。首先应该看到官办军事工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封建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则由国库按定额拨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没有依靠自身运转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工厂在大机器生产下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工人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被购买，这是近代官办军事工业的独特性之所在。实际上，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复杂混合物，是封建官营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这里，企业并没有一下子摆脱封建官营企业的固有性格，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仍然保存下来，但企业不是旧日官营企业的简单再版，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经开始萌生。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畸形现象和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清政府不久就发现：军事工业很是缺乏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产品成本高昂，一艘自造军舰所花的经费，可以用来向外国购买两